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

第 4 辑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

第 四 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

第 四 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排版

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301千字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800册

统一书号: 10190·095 定价: 1.45 元

目 录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

· 第 四 辑

《法兰西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前言与各家

- 小议 李健吾 (1)
- 略论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钱中文 (69)
- 普列汉诺夫文艺遗产中的几个问题 吴元迈 (109)
- 法捷耶夫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薛君智 (159)
- 论迦梨陀娑的《云使》 黄宝生 (200)
- 漫谈《圣经》文学 牛庸懋 (216)
- 但丁·阿里盖利 田德望 (238)
- 论拉封丹的寓言创作 郑克鲁 (258)
- 马克·吐温与中国 张廷琛 (284)
- 伐佐夫的创作道路浅析 樊 石 (309)
- 德莱塞、路易斯和安德森 朱 虹 (334)
- 约翰·多斯·珀索斯和《美国》三部曲 董衡巽 (365)

学术活动报道

-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在上海举行 (385)
- 高尔基学术讨论会在大连召开 (387)

- 书讯五则 (392)

Studies in Foreign Literature (No.4)

Contents

<i>Li Jian-Wu</i> ; Preface to "Literary Theory of 17th Century Classicism in France" and Some Notes on the Writers Concerned	(1)
<i>Qian Zhong-Wen</i> ; Tolstoy's Views on Realism in Literature and Art	(69)
<i>Wu Yuan-mai</i> ; Some Issues in the Literary Heritage of Plekhanov.....	(109)
<i>Xue Jun-zhi</i> ; Fadeyev's Views on Socialist Realism	(159)
<i>Huang Bao-sheng</i> ; Kalidasa's "Meghaduta".....	(200)
<i>Niu Yong-mao</i> ; Notes on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216)
<i>Tian De-wang</i> ; Dante Alighieri.....	(238)
<i>Zheng Ke-lu</i> ; La Fontaine's Fables	(258)
<i>Zhang Ting-chen</i> ; Mark Twain and China	(284)
<i>Fan Shi</i> ; The Literary Career of Vazov.....	(309)
<i>Zhu Hong</i> ; Theodore Dreiser, Sinclair Lewis and Sherwood Anderson.....	(334)
<i>Dong Heng-Xun</i> ; John Dos Passos and His "USA" ...	(365)

News of Academic Activities: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Held in Shanghai	(385)
Discussion On Gorky Held in Dalian	(387)
New Books	(392)

《法兰西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前言与各家小议*

李 健 吾

一 前 言

想介绍好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文艺理论，不能忘记各先进邻国的文艺理论；它们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有密切的交往关系。说到这一个国家，我们不能丢开另一个国家，它们承受的影响是共同的，他们的觉醒几乎是前后相连接的。法国十七世纪是继承法国十六世纪的，但是同时也继承了邻国的十六世纪；寻找法国十七世纪的因缘，我们必须从十五世纪、甚至十三世纪的但丁入手。它有土生土长的一面，也有息息相通的一面，文艺理论不是一个绝缘体，它能无翼而飞、不胫而走、随地生根发芽，看似大树一株，其实脉络贯通，仿佛中国的竹林，在地下一片相连。自然界如此，文艺理论亦然，道理是相通的。文艺复兴正是在欧洲蓬勃发展起来。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特征，但是特征到底是什么，我们骤然之间却难得出回答。为什么这一时代风起云涌，霎那之间出现了那么多的伟大作家，我们更难回答。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古

* 《法兰西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文艺理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李健吾同志编选的一部资料，即将出版。本刊所载的是该书前言与对所选各家的评介。

希腊为什么会出现悲剧作家和喜剧作家和如此之多的地杰人灵？公元前二至一世纪和公元后一、二世纪的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又出现了连串的不朽拉丁作家，而从十三世纪但丁开始，人类在蒙昧的宗教羁绊之下觉醒。直到意大利、英吉利、西班牙和法兰西的文艺复兴，出现了辉煌的成群的伟大作家，都是什么缘故？众说纷纭，我们一时很难把来龙去脉说得明白清楚。

归功于某个统治者的开明专制？还是归功于某种战争威势？还是归功于政坛变乱？我们都很难找到准确的语言予以肯定。中国历史变动亦然。战国为什么蜂拥而起那么多伟大作家？唐代为什么出现那么多伟大诗人？北宋末年为什么出现你追我赶的各体词家？我们一时很难找到一条规律。难道和统治者的政绩有关？和战争胜败有关？和政治动乱有关？我们能不能把英吉利的莎士比亚等一群伟大作家说成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产物？我们能不能把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和维伽说成西班牙战败的产物？我们能不能把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归功于教皇的恩赐和各城邦之间的纠纷？最后，我们能不能象“今派”吹捧一些渺小的诗人，并归功于伟大的路易十四？还是资产阶级的兴起带动了这么多的大作家？然而中国长期封建历史却是反面的见证。而大作家中，也正不乏贵族阶级之人。

可能这些是原因也可能不是原因。可能这些有关系也未必就是必然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编这部《法兰西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文艺理论》，要把邻国先驱者作为第一阶段收在这里的缘故。我们还将指出，有些理论不是古典主义者所独有的，更将指出古典主义并无古典主义这个东西。我们这里用“古典主义”只是随声附和，走前人的道路。

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实际上是戏剧理论，特别是

以悲剧为首的文艺理论。为什么要以它为首呢？由于排列名次，古人总是把悲剧放在第一位，其次是史诗，其次是喜剧，其次是各种诗体，而小说、演说、书信、格言等等是不算在里面的。布瓦洛虽然开头从诗体说起，重点显然还是在悲剧、史诗、喜剧这个层次上安排出来的。喜剧来自民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残稿里又没有怎么说起，古典主义者们贬低它，还是有所依据的。贺拉斯在他的《诗艺》里已经给后人做了启示。这种等位观念同样也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观点。悲剧写英雄，史诗写英雄，而喜剧则写一般人民。莫里哀由于写下层人民，写人民爱看的闹剧，死后就受到好友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指摘，说他赶不上文学喜剧的剧作者泰伦斯。古希腊悲剧多写传说中神祇与部落首领之间的利害关系，到了古典主义者手里，就依样画葫芦，局限于古代帝王将相。拉辛写同代帝王将相，如《巴雅塞》(Bajazet)，还在序里特别说明，以地理遥远(君士但丁堡)来代替“古代”的限制。等级制度在演员方面表示得尤其严峻。“戏子”的身份是贱民中的贱民，教会给他们以“出教”处分，死前必须向教士忏悔请罪，才能被许可埋葬在教堂管辖的公墓。巴黎大主教便是以莫里哀死前没有忏悔(教士拒绝为他做忏悔，冤仇结得太深了)为借口不让教堂为他安排公墓坟地的。布瓦洛在一六七四年发表《诗的艺术》就要求诗人要熟悉人民(资产阶级)和宫廷(贵族阶级)，而对新桥(等于中国旧社会的天桥)江湖艺人达巴桑则一再加以攻击，甚至以爱好达巴桑为贬低他早年崇拜的莫里哀的口实。除各种诗体外，他对新兴的艺术一字不提，就可以明白古典主义理论家们的偏见是多么深和多么固执了。

马莱尔伯(Malherbe, 1555—1632)在一六二五年部分发表的《代保尔特^①注释》里就一再申斥他用语“不合宫廷”(Peu Cour-

^① 代保尔特(Desportes, 1546—1606)是法国诗人，曾经得到查理五世与亨利三世的恩幸。

tisan)“庶民化”(Plébé),甚至“下流,比庶民还要坏。”他的批评完全是从贵族阶级的立场出发的。

这是有其历史与社会根据的。

波旁(Bourbons)王朝是从亨利四世(1553—1610)登上法兰西王位(1589年)开始的。这位勇敢、机智的机会主义者在宗教纠纷之中度过他的一生。他是法国西南部一位大领主,信仰的却是卡尔文在瑞士创建的新教,即胡格诺派(Huguenot)。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的夜晚,查理九世听从太后(意大利人)的话,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对新教徒的大屠杀。这位大领主的新婚典礼以惨剧收场。他靠改变信奉天主教的谎话逃过这场宗教悲剧。四年之后,他逃出巴黎,纠集了全国的新教徒,和信奉天主教的国王派进行了你死我活的血腥内战。查理九世在一五七四年死去,他的兄弟亨利三世接了位,又在一五八九年死去,死前承认亨利四世有继承权。由于西班牙的干扰和巴黎派的对抗,他被迫在一五九三年改变宗教信仰,终于在第二年进入巴黎。直到一五九八年,他和西班牙缔结了和约,宣布了“南特(Nantes)诏令”,承认信教自由,才结束了这场不得人心的宗教战争。在内战中权诈多变、目无朝廷的都是那些各自为政的大、小领主,即封建贵族。

而这位雄心勃勃的新国王,被一个贫无所归的天主教狂徒叫拉外雅克(François Ravaillac)的,在一六一〇年五月十四日,用偷来的斧子在街上砍死。得意的是他的意大利王后,一下子成了摄政的太后,相信一个无能的意大利人,挥霍国库积蓄,引起各大领主的动乱,又把国家带上分裂的道路。

总之,在路易十三少年和当政之后,有好几个大问题摆在他面前:第一,剪除太后的同党,和太后进行无情的斗争;第二,整顿各大领主的分裂主义;第三,应付日耳曼帝国和西班牙(实际上是一

个，西班牙兼有帝国的统治权)的外患；第四，平息以英国为靠山的新教反抗。这期间出来一个铁腕人物，是太后在一六二四年推荐给路易十三的黎希留(Richelieu, 1585—1642)。他是一个善于斗争、敢于斗争的枢机主教兼首相的阴谋政治家；他的“阴谋”是用来对付这四种恶势力的。路易十三生他的气，但是不得不钦佩他为自己努力平定法国的一片心力。他虚荣，喜功，说假话，交接诗人文士，以风雅自赏，但是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还路易十三一个安定的国家。他驱逐介绍他的太后，镇压敢于捣乱的大领主，逼和西班牙，最后消灭了新教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罗马教皇对法国国王有加冕权与教会行政自成体系的封建统治权。法国十七世纪在形成专制政体期间，一直在斗争中和它妥协，在妥协和它斗争；宗教不分国界，教皇有无上权势。在宗教战争中两派都没有祖国这个概念。新教(即基督教)拉英国，旧教(即天主教)拉西班牙，都作为同一信仰互相支援，两下意识中都不存在祖国这种高尚概念。爱国(Patriote)这个字的现代意义还没有出现。它在当时的意思只是“同乡”、“同人”的意思。在黎希留死后，直到一六四七年，路易十四在童年时期，才增添上“爱国”这个意思。但是到十八世纪，卢梭才给它下了一个正式定义：“凡爱国者都对外国人没有感情。他们在他眼里不存在，不过是人而已”(引自《洛贝尔 Robert 字典》1972年版)。所以黎希留利用枢机大主教的名义辅佐路易十三，死前推荐在他手下工作的枢机大主教马扎兰(Mazarin, 1602—1661)做首相，不是没有用意的。他要马扎兰继承他的政策，对付一切扰乱王权的敌人。马扎兰原本是一个意大利人，一六三七年改入法国国籍，一旦当了法国首相，惹起两次“投石”政变，资产阶级不听他支配，接着大贵族们又和他捣乱，幸而摄政的太后和他私下结了婚，他又诡计多端，把比他还懦怯的政变领袖平定下来(不如说是收买下来)。

他们夫妻(私下里)带着童年的路易十四东西颠簸,给小小心灵留下很大的创伤,所以他在马扎兰死后正式接受政权时,就宣布政权集中,“朕即国家”,再也不用枢机大主教和首相。

但是远在亨利四世时期,天主教死硬派耶稣会(1603年亨利四世召回耶稣会)就利用信仰自由这个诏令大大发展起来。路易十三的太后又是一个意大利人,天主教的昌盛也就成了必然之势。一六一一年大主教贝瑞尔(Bérulle, 1575—1629)从罗马把在一五六四年成立的奥拉托利(Oratoire)修道会引入法国,一六一七年攫去了对年轻人的教育权;一六一八年,福朗斯瓦·德·萨尔(François de Sales, 1567—1622)创建了“圣母拜访会(Ordre de la Visitation)女修道院”,万散·德·保罗(Vincent de Paul, 1583—1660)又成立了“爱德Filles de la Charité女修道院”^①,女孩子没有地方受教育,从此全由修道院包办下来,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我们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都还告诉我们这种教育对女孩子们的毒害有多么深。耶稣会的引入同时还带来宗教裁判所的声威。

一些无辜人士动辄得咎。一六〇〇年,批判经院哲学的布鲁诺被意大利的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意大利哲学家瓦尼尼(Vanni)在一六一九年以妖术的罪名在法国西南部的图鲁兹(Toulouse)烧死。年迈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在一六三三年受到审判,在一六四二年郁郁去世。顽固派显示了他们不可理喻的专横态度;知识界开始为自己寻求各种安全的可能。怀疑论者笛卡尔(1596—1650)在一六二九年离开法国,到荷兰著述立说去了。法国一位著名诗人代奥菲尔·德·维欧(Théophile de Viau, 1590—1626),信奉新教,当时摄政的太后把他驱逐出境,后来奉命赦回,一六二二

① 依照《法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法。

年书店盗用他的名字出了一本选集，收了他几首诗，被耶稣会告发，判他火刑，他躲藏起来，又被发现，终于在各方营救下，在一六二五年改判流放。第二年他就郁郁死去。于是这位十七世纪最有希望成为第一流大诗人的青年就这样被迫害致死。直到一六六五年，另一位年轻的讽刺诗人勒玻提(Lepetit)，才二十五岁，写了一首《滑稽的巴黎》(Paris ridicule)的短诗，就被耶稣会教士告发，在巴黎的沙滩广场烧死。而另一位出名的讽刺诗人布瓦洛，却在《诗的艺术》中竟然以冷酷的笔墨告诫一切诗人，说什么：

然而这种危险的快活精神并不合适，

可能把上帝多少变成可怕的说笑主题。

无神论提倡这些形形色色的耍笑，

最后，可怜的揶揄者便在沙滩死掉。

这件事出在路易十四力图恢复集中政权的时期，我们可以想象，他并不怎么喜欢这种以教权代替国王意志的蛮横的作法。在烧死勒玻提之前，据说他就暗示莫里哀写戏讽刺宗教界言行不一的行为。这就是还没有写成的三幕的《达尔杜弗》奉命进宫演出的原因。消息传出去了，惊动了宗教界顽固派，因为太后是西班牙人，而他的师傅又是巴黎大主教，他们拥有强大的活动能力。路易十四让步了，借口戏没有写完，说什么等戏写完了再演。最后，太后在一六六六年死掉，教皇的“教会和平”的诏书也颁发了，教会人士不得不有所收敛，莫里哀在国王正式（私下早已答应上演）应允下，正式公演。但是教堂的堂长并不饶恕他，巴黎大主教也决不因此就善罢甘休，借口莫里哀死前不做忏悔（其实是他们拒绝不来），不给坟地，后来在路易十四调停之下，虽然给了（在埋小孩子的公墓里），最后，据说，还是私下把坟刨开，将骸骨扔掉，使世界首屈一指的喜剧家死无葬身之地！一六七七年，布瓦洛在公开信中曾经为莫里哀谴责某教士道：

有人热心为牵连的信士们做辩护，

由于他的俏皮话就判他火刑。①

莫里哀仅仅免于身受火刑而已。

这是当时年轻的路易十四，他保护莫里哀，因为他的宫廷娱乐离不开这位应命迅速的喜剧人才。他对耶稣会的争权的小动作是有所戒备的。在一六六一年，和社会上非教会人士串连在一起的圣体会(Compagnie du Saint-Sacrement)遭到禁止；他们组织“信徒党”(Cabale des dévots)，从一六四〇年起，秘密活动了整整二十年，干涉私人活动，非法告密的事件都是他们这些信徒们干的。他们解散了，但是他们在反对《达尔杜弗》的明里暗里的活动中，还起着不小的作用。路易十四随着年事的增长，在王后曼特依(Maintenon)的影响下，虔笃之心增加了，觉得政权日趋巩固，教会的纠纷似乎不存在了，便在一六八五年废除了他祖父为巩固波旁王朝而决定的南特诏令。小资产者的新教徒携带着家小和资财纷纷逃离法国，造成法国的贫困，完全出于他的意外。这是一个他不了解的阶层，因为他周围不是无权的贵族（即宝剑贵族，一般多是中、上层武将），就是维护既得利益的上层资产阶级（即长袍贵族，一般都是世袭的法官、税官），他对人民中间的情况可以说是根本一无所知。一六七七年，在布瓦洛给拉辛写上述那封公开信的时候，怨气冲天的拉辛决定再也不写戏了②，然而经不起虔笃的王后的邀请，他在一六八九年又抬起了笔，因为演员都是修女，他就采用《旧约》的《以斯帖》(Esther)的题材来写戏。由于修女多，他添上了合唱队。一六九一年，路易十四建议他用犹太民族的女王

① 据说，指著名的布道人耶稣会教士布尔达鲁(Bourdaloue, 1632—1704)。引自布瓦洛的《书简诗》(Épître)第七。

② 由于《费德尔》一剧引起纠纷的缘故。

阿达莉(Athalie)的题材来写戏。拉辛也应命写成了。这是犹太民族在最困难期间蒙主施恩，得免于难的故事。也是拉辛最后写的两出宗教戏。他似乎应该受到奖赏，但是由于和让逊派(Jansénisme)和解，回到童年教养的怀抱，^①路易十四不信任他，疏远了他。他就这样在郁闷失欢的心情中去世。

让逊派是天主教内的一个被认为邪说的教派。让逊(Jansénius, 1585—1638)是比利时的一位荷兰主教，一六三三年发表过一篇反对黎希留政策的文章，当时一点没有影响，死后在一六四〇年出了一本他的遗著，支持圣·奥古斯丁努斯(Saint Augustinus, 350—430)的“心灵不自主，一切都看上帝宽恕”的理论。这本来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却触犯了教皇的看法，那就是：人是自主的，宽恕不能改变为善与为恶。耶稣会以服从教皇之命为职志，对让逊派大兴问罪之师，和“伟大的阿尔诺”(Arnauld, 1612—1694)争论起来了。阿尔诺的父亲安东(Antoine, 1560—1619)是高等法院的律师，为巴黎大学做过辩护，攻击过耶稣会，子女很多，有六个女儿全在巴黎的王港(Port-Royal)女修道院做修女。在几个儿子中间，有一个叫安东·阿尔诺，即“伟大的阿尔诺”的，是让逊派的一位巴黎大学博士，攻击耶稣会的腐烂生活，成了新派的领导人。他有两个姐妹先后都是王港女修道院的院长。院址有两个，一个在巴黎城内，一个在远郊，远郊是旧修道院，迁移到巴黎以后，就成了男修道院。男女两座修道院都以清心寡欲，修身养性闻名。在和耶稣会斗争中，安东·阿尔诺得到了一个以神童见称的天才科学家与虔诚信徒的大力协助，这就是法国十七世纪和哲学家笛卡儿并称的帕斯卡。

^① 拉辛是一个贫苦的孤儿，三岁起无依无靠，由王港女修道院收养，在小学上学，后来又保送他进了中学。

他在一六五六年一月和一六五七年三月，接受阿尔诺的建议，不署名地连续发表了十八封《与外省人书》，攻击耶稣会，成为宗教争论的经典文献。这些书信笔锋犀利、措辞尖俏，以罕见的风格震动了全法兰西。教皇当即把它列为禁书。但是由于不署名，尽管圣体会与耶稣会动员了全部力量，也没有查出作者的姓名。而五年后，这位大思想家就夭亡了。路易十四当时对这部书表面不作声，其实心里热烈欢迎，因为这有助于国王的Régale特权。Régale是国王任命大主教和主教与教区职位的特权，更重要的是夺取空缺的教区财政收入的特权，是历代国王视为必争的特权，路易十四一直雄心勃勃，想把这种特权向法国南方开展。

但是，在攻击莫里哀的喜剧上，让逊派却和它的对头圣体会、耶稣会同样猛烈。

路易十四其实很不喜欢让逊派，因为他厌恶宗教上的分裂，正如厌恶政治上的分裂一样，而让逊派偏偏又和他童年为之逃难的投石政变的贵族们有往来。权衡之下，他对让逊派比对圣体会要不客气多了。巴黎大主教阿尔都安·德·派莱费克斯(Hardouin-de Péréfixe)是出名的严厉，对莫里哀不宽恕，对巴黎的让逊派女修士同样不客气，一六六五年七月把他们赶到远郊王港的旧址。阿尔诺在一六七九年逃到比利时，继续斗争。但是国王年纪大了，越发虔诚了，一七〇九年十月，他派警卫队把远郊二十五位老姑娘，一个不留，分开送到各地的女修道院，把家具和圣物全部予以没收，一七一一年，索性连埋在那里公墓的两、三个骸骨全部挖出，大部分扔进乱坟堆，少数由家人收回。第二年索性连教堂和净室也拆除掉，结束了这场残酷无比的斗争。

莫里哀在宗教界两面夹击之中，不得不和青年时期寻欢作乐、有所作为的路易十四朝夕周旋，实际上，也和自己善于忍让、应付和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以保存自己的剧团相关。因为他从心

里起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这个唯物主义者还是一个自由思想者。这是他不情愿向人公开的。在亨利四世末年，在耶稣会扩张它的慈善事业与教育事业的期间，还在让逊派未曾出现之前，就在巴黎涌现了一批自由思想者青年，我们方才说起两个受难的青年诗人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没有组织关系，不去教堂，或者用做礼拜掩护自己的内心看法，不露声色。我们知道，笛卡儿是以怀疑论著称的唯理主义者，他有坚决反对经院哲学的一面，怀疑一切的实体必须经过实践活动才能存在，因为理性是普遍存在的，最大的证明即是有“见识”。为了证明理性的存在，他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理论，原来他承认精神的活动的活动是第一位，于是他的理性实体就把主观实体包括进来，而把“思”推到了第一位。这样，他就成了唯心主义者。他虽然远住荷兰，因为有些文章是用法文写的，对法国文学清洁运动的马莱尔伯诗派就起了配合作用，被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肯定下来。但是同样提倡理性的伽桑狄（Cassendi，1592—1655）却以唯物主义的古代原子论反驳了他这种唯心主义的看法。笛卡儿认为灵魂是不朽的，伽桑狄认为灵魂是随着身体的灭亡而灭亡，而把这种灭亡，归因为肉身的灭亡，而肉身（即物质）则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下去。理性是感觉的外观，不是实体，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本质，而在于高低，全有理性，只是机构不同，认识或经验不同，因而表现不同。理性不是起伏无定，而是恬静，是了解事物的本领，可以医治一切恐惧的起因，如神鬼或死亡。他接受被烧死的布鲁诺的天体学说，直接和伽利略通信，但是，他的著作全部用拉丁文写出，本人又是修道院院长，所以尽管受到耶稣会的排挤，他还能以教授身分出现，解聘之后，又能以家庭教师身分糊口，他当家庭教师教的唯一学生沙派尔（Chapelle，1626—1686）却是莫里哀的同窗好友。传说莫里哀听过他的课，受到深远的影响，曾经把公元前一世纪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的《物